

唐人环保意识述论

——以唐长安城为中心

赵明畅¹, 李 沛²

(1.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2.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 要:唐代首都长安城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众多的居民和发达的经济使得其城市规模庞大。为创造长安城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 长安城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中, 均体现出唐代人的环境保护意识, 如环境绿化意识、市容美化意识、公共卫生意识、污水处理意识以及初步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唐长安城的环境保护以唐官方为主导, 城内民众参与, 同时辅助以严格的法律规定和处罚作为约束。唐官方和居民共同为长安城环境作出的努力, 值得被现代社会环境保护所借鉴。

关键词:唐代; 长安城; 环保意识; 绿化; 公共卫生; 污水处理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6)04-0053-06

唐长安城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 长安城在规划设计和城市运行中, 诸多方面均体现出唐人的环保意识, 唐人已经开始为长安城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付诸努力。关于唐代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 刘华《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 从唐代的植树造林、生物资源和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自然环境的保护等方面论述了唐代环境保护的情况^[1]。关于唐代长安城的环境保护, 学界已有部分研究成果, 与长安城绿化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 如罗桂环《唐代长安城绿化初探》, 从住宅园林、林荫道、森林和郊区园林等三方面探讨了唐代长安城的绿化情况, 并分析了长安城绿化情况良好的原因^[2]; 何启泽《唐代长安城道路绿化初探》, 以长安城的道路绿化为中心, 论述了行道树的起源、长安城行道树种的选择、唐政府对于道路绿化的重视、城内道路绿化良好的原因等^[3]。刘洋《从唐代诗文看唐人的环保意识》, 则以唐代诗文为线索探索了唐人的生态观念^[4]。但在长安城居民的环保意识方面仍有一定的探索空间, 本文结合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 以唐长安城为中心, 主要从长安城的城市绿化、市容美化、公共卫生和污水处理等方面探析唐人的环保意识。

唐代设置有专门的机构管理长安城和周边京畿地区的环境, 据《旧唐书》记载, 由尚书省工部虞部郎中和员外郎统筹管理。虞部“郎中、员外郎之职, 掌京城街巷种植, 山泽苑囿, 草木薪炭, 供顿田猎之事。凡采捕渔猎, 必以其时”^{[5][64]}。尚书省工部虞部郎中和员外郎, 统筹负责长安城内街道的植物种植以及京城的山泽、草木、渔猎之事。一方面, 说明唐政府对于长安城城内及京畿地区环境的重视; 另一方面, 渔猎不违其时, 在侧面也体现出唐代人的环保意识。

收稿日期: 2016-04-21

作者简介: 赵明畅(1991-), 男, 安徽亳州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史。

一、唐人的环境绿化意识

唐长安城地处中国西北地区,远离海洋,距离黄土高原较近,气候相对干燥,且城内土壤为黄壤,蓄水性差,遇到干旱天气,尤其是春夏季,尘土飞扬。白居易《酬张十八访宿见赠》诗云:“长安久无雨,日赤风昏昏。怜君将病眼,为我犯埃尘。”^{[6]4736} 这形象地表明长安城内干旱天气尘土飞扬、气候炎热的情况。加之长安城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和规模最大的城市,众多的人口和往来使者更使得长安城注意城市的良好形象,这些原因共同促成了长安城官方和城市居民对绿化的重视。

从王维《登楼歌》“俯十二兮通衢,绿槐参差兮车马”^[7]、曹松《武德殿朝退望九衢春色》“夹道夭桃满,连沟御柳新”^{[8]246},可略知唐长安城的道路绿化多以槐树和柳树之属为主。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玄宗“令两京道路,并种果树”^{[8]1573}。除城内道路两旁的绿化外,长安城的设计也注重大面积的园林绿化,禁苑位于城北,“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三里”^[9],其中有大片的果树林,除城市绿化作用外,也生产水果供皇族食用。禁苑之外,长安城中还有东内苑、芙蓉苑、道会苑等皇家园林,这些园林里遍植奇珍异草,绿树成荫。长安城外郭城的里坊中也有私家园林,如德宗于安业坊赐程怀直别宅,“有池榭林木之胜”^{[10]315};新昌坊有“吏部尚书裴向竹园”^{[10]310}。此外,长安城中亦有众多寺观,这些寺观的绿化亦构成长安城绿化的一部分,《长安志》载:安业坊唐昌观“观有玉蕊花,花每发若琼林玉树”^{[10]314};崇业坊中有玄都观,大和年间此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10]315}。长安城中众多寺观的绿化点缀起长安城的外郭城。

长安城内也有众多人工开凿的池沼湖泊,曲江位于长安城东南隅,是长安城面积最大的水域。曲江池夏季“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11]。除曲江外,城内还有太液池、兴庆池、九曲池等众多池沼湖泊,这些池沼湖泊多为人工开凿而成,又于水边遍种林木和建造人文建筑,周围绿树成荫,景色秀丽。城内众多水域,为长安城提供了湿润的空气,一定程度改善了长安城干燥炎热的气候,也增加了长安城的绿化面积。

唐朝官方的绿化意识尤强,贞元元年(785年),德宗令“京兆府与金吾计会,取城内诸街枯死槐树,充修灊、浚等桥板木等用,仍栽新树充替”^{[8]1578}。贞元十二年(796年)“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京兆尹吴凑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8]1576}。可见,在唐人心目中,槐树作为长安城内沿街绿化树木,与长安作为天下之中的地位最相适宜,且城中诸街枯死的树木可及时清除以供他用,并且要用新树予以及时充替。另外针对于地方,唐政府也规定“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斫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8]1574}。最后,唐政府对沿街树木的种植提供经济支持,文宗时,“诸街添补树,并委左右街使栽种,价折领于京兆府,仍限八月栽毕”^{[8]1576}。可见,唐长安城的城内树木栽种由京兆府提供资金支持,由左右街使具体负责街道树木的栽种和管理。

长安城内沿街绿化主要使用槐树,槐树粗壮笔直且高大茂盛,在荫道的同时还可吸灰纳尘。官方建设的皇家园林、里坊中广泛存在的私家园林以及寺观的绿化,共同构成了长安城的绿化。长安城的绿化是官方主导,百姓参与,绿化城内环境的同时,也体现了唐人的绿化意识。

二、唐人的市容美化意识

长安城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有众多外国使者和客商往来其间,因此唐政府尤其注重对长安城市容的美化。长安城由北向南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组成,以中部的朱雀大街为对称轴,分为对称的东西两部分,城内道路纵横交错,将外郭城划分为109个里坊和东西两市。

为维护长安城的整齐规划与工整布局,唐政府对长安城沿街民众都有严格的要求。开元年间有规定,长安城“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8]1575}。《唐律》中也规定“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12]488}。城内为维护街道的平坦,禁止于街巷中挖坑取土,法律对于侵占街巷

的行为处罚严重。大历年间,亦有规定“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8]1576}。对于侵占街巷造舍的行为,政府予以严厉打击。这仍是为了维护长安城内街道的整齐划一。大中三年(849年),义成军节度使韦让“于怀真坊西南角亭子西,侵街造舍九间”,随即被右巡使上奏,最终“颇越旧章,宜令毁拆”^{[8]1577}。由此可见,右巡使负责巡逻城内的街容是否整洁,并对违章建舍行为进行汇报,且唐官方对侵占街巷的行为亦予以严厉打击。

长安城对城内各街的统一规划,加之唐长安实行里坊制度,商贩集中于东西两市,因此城内各街道相对宽广,这样既便利了城内出行,也使得城内市容状况良好,体现出长安作为国际大都市规整方正的大一统磅礴气势。

三、唐人的公共卫生意识

众多人口聚集于长安城,城内的公共卫生状况直接关系到城内居民的健康状况,因此唐政府对城内公共卫生有严格的规定进行约束。针对沿街居民丢弃垃圾,《唐律》里有严格规定:“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12]489} 城内对于沿街乱扔污秽者的处罚尤其严重,且监管不力亦会受到同样惩罚。此外,从唐代的一些笔记小说的记载中,可知长安城内的生活废弃物也为一些居民提供了致富的途径,如唐初长安城居民裴明礼“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13];“长安富民罗会以剔粪为业”,因而“家财巨万”^[14]。城内有居民靠收集垃圾和粪便发家致富,这样一方面对城内公共卫生的维护有一定帮助;另一方面,粪便和垃圾的减少,控制了蚊虫数量,既减少了传染源,也减少了传染病的传播体,体现出唐人对城市公共卫生的保护意识。

对于长安城内居民的疾病和传染病,唐政府也采取措施加以控制。长安城中设置有病坊,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断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8]863}。唐代病坊多被学者认为是一种收养贫病平民的慈善机构,长安城内病坊的设置与佛教有着重要关系,且城内病坊的运行也主要是由寺院提供场地和经济支持。长安城内的诸多病坊收养了贫病居民和乞丐,当传染病爆发时,在一定程度上就隔离了传染源,显示出唐人的公共卫生意识。武宗灭佛后曾下敕:“悲田养病坊,缘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两京量给寺田赈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管选耆寿一人勾当,以充粥料。”^{[9]607} 可见,武宗灭佛后,因僧人大量还俗而导致病坊的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官方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以保证病坊照顾贫病民功能的运转。针对城内传染病,唐代法律也有专项规定,如对城内狂犬病的控制:“诸畜产及噬犬有抵蹋啮人,而标帜羁绊不如法,若狂犬不杀者,笞四十;以故杀伤人者,以过失论。若故放令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12]285} 官方以严格的规定和处罚从源头上减少传染病传播的可能性。

唐官方对于城内居民也有基本医药知识普及,政府曾将药方广布群众,为城内居民的日常疾病提供常用药方。天宝五年(746年),玄宗《榜示广济方敕》:“命郡县长官,就广济方中逐要者,于大板上件录,当村坊要路榜示。”^{[15]595} 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因“温湿不时,壅郁为疠,或僻远之俗,难备于医方;或贫匮之家,有亏于药石。失于救疗,遂至伤生”,故颁布《贞元集要广利方》,“宜付所司,即颁下州府,闾阎之内,咸使闻知”^{[15]595}。以上两则材料虽未明确表明颁布常用药方是针对于长安城内居民,但推行范围是全国之内,长安城自然也包括其中。唐官方向民众所布示药方简单且药材易得,对于城内居民的日常疾病治疗很有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城内居民的健康水平,进而也就维护了城内的公共卫生状况。

在传染病爆发时,唐官方亦采取措施,如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六月“关中初雨,麦苗涝损,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疠,死者枕藉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瘞”^{[5]110}。在长安周围地区发生灾疫时,高宗下诏对瘟疫死者进行掩埋,目的也是为隔断传染源,防止瘟疫的进一步扩散。此外,唐官方也采取相应的医疗救济措施控制传染病,文宗《拯恤疾疫诏》:“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16]唐政府对于城内居民的医疗保障和疠疫爆发时采取的救急措施

对防止传染病的大肆传播都有一定控制作用,均体现出了唐人的公共卫生意识。

四、唐人的污水处理意识

长安城内居民的生活污水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排放,第一种是排水沟排放,在历次唐长安城考古活动中,在唐长安城的主要道路和坊的周围大都发现了沟渠的遗迹。据考古报告长安城的各街两侧水沟形制当差异不大,沟的宽度均在 2.5 米以上,口宽底窄,两侧倾斜。在对西市的勘察中,发现在有的巷道下面有砖砌的排水暗道,通向大街两侧的沟内^[17]。由此可见,唐代长安城的排水设施相对来说较为完善,在城内各街的两侧均建造有排水沟,部分拥挤的巷子里还建有排水暗道,这样就方便了雨水和生活污水的及时排出。渗井是唐长安城生活污水排放的另一种方式。唐长安城考古中曾多次发现渗井,1982 年在西北大学发现唐代太平坊温国寺内的两口砖砌渗井;1985 年发掘唐代西明寺遗址,发现多口渗井^[18]。唐代渗井的深度一般在 2 到 3 米之间,坑口呈圆形、长方形等,形状不一,部分渗井建有砖砌管道与排水道相连接,部分渗井则作为单一的渗井存在^[19]。渗井在长安城内是辅助排水沟而存在的一种排水系统,其在历次考古活动中的大量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唐长安城内的排水沟排水不畅,不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污水的排放,所以城内居民大量开挖渗井,作为最简单的存储和排放污水的方式。

唐人通过排水沟和渗井排放生活污水时,为了防止杂物淤积排水沟和渗井污染地下水,在污水排放之前,唐人已经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对污水进行了简单的处理。1955 年在西安北郊发掘出一段唐代排水沟,属于地下暗渠,每隔一段安装一组闸门,第一道闸门由铁条组成,第二道是镂孔的铁板,且在第二道闸门处发现大量石灰渣、残砖瓦和骨头等^[20]。这当是唐人为防止排水沟淤塞而采取的措施,第一道闸门用于阻隔大型污染物,第二道则用于阻隔小型污染物,是唐人对生活污水的一种简单处理方式。在通过渗井排放污水时,唐人也在渗井底部增加过滤层,对生活污水进行简单的过滤,例如在大明宫太液池发现的渗井的填土中,发现部分夹杂有砖瓦残块、灰烬和白灰渣^[21];1994 年在西安新后村西南侧发现的渗井,自井口深 2 米以下经钻探为青泥淤积层夹陶片堆积^[18]。这些砖瓦残块和灰烬置于渗井底部的夹土中,对于废水有一定的过滤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污水对长安城地下水的污染,而且在考古活动中发现渗井周围往往很少有水井,说明唐人已经意识到渗井对于地下水的危害,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唐代的污水处理工艺和唐人的环保意识。

五、唐人初步的可持续发展意识

在唐长安城居民的城市日常生活中,除注重城市绿化、市容美化、公共卫生和污水处理之外,唐人也体现出了初步的可持续发展意识。这其中最主要的体现就是长安城内的东西两市中均设置有放生池,东市放生池位于市场东北角,“分产水,渠自道政坊东入城,西流注此池”^{[10]291}。西市放生池位于市场西北部,“长安中沙门法成所穿,支分永安渠以注之”^{[10]337}。放生池的出现与唐代佛教的兴盛有着密切的联系,佛教劝诫杀生,长安城市场中设置放生池可劝诫居民戒杀生,放生于池中的动物可沿水渠回归自然,对动物保护有一定作用。

除此之外,唐代曾广泛推行“断屠钓”。唐代的断屠钓是在特殊的日子,如斋日,佛道教节日等特殊日子,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百姓捕捉鱼虾和宰杀动物。武德二年(619 年)诏:“自今以后,每年正月九日,及每月十斋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钓。”^{[8]731}如意元年(692 年)五月“禁天下屠杀”^{[8]731},唐代断屠钓的实施并不局限于每月十斋或者忌日,在遭受自然灾害之时,尤其是旱灾时也会实施,如懿宗咸通十一年(870 年)六月“京城久旱,未降雨间,宜权断屠宰”^{[8]734}。此后各皇帝均有推行断屠钓之属的措施。

唐代断屠钓,对下层百姓影响极大,武后崇佛,尤为重视断屠钓的推行。武后长寿元年(692 年),右

拾遗张德因得子而宰羊招待宾客,遭武后当庭对仗,叩首服罪,可见武则天时断屠钓实行方式极端。武后在大力推行断屠钓的同时,又任用酷吏,杀人如麻,“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22]。玄宗先天元年(712年)敕“禁人屠杀鸡犬”^{[8]732},先天二年(713年)敕“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不得官当荫赎。公私贱隶犯者,先决杖六十,然后科罪”^{[8]732}。断屠钓的广泛实行,由唐上层统治者主导,武后开始,执行愈发严格和偏激,且涉及范围愈广,不遵守者所受处罚亦很严重。断屠钓的推行可视为是唐统治者在标榜自身,对百姓要求严格,自身往往大开杀戒。但其实行过程中,毕竟对物种和生态的保护有一定积极作用,侧面体现出唐代统治者初步的可持续发展意识。

放生池和断屠钓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利于维护人与自然的平衡,对保护动物的多样性有帮助,且在特殊时间段内推行断屠钓之属的措施,尤其是在自然灾害发生时,更能保护某些物种的繁衍和生存,保证人与动物的和谐,利于长久发展。

六、结语

唐长安城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其在城市规划和城市运行中都倾注了长安城官方和居民共同的努力。唐人的绿化意识、市容美化意识造就了长安城良好的生态环境,而唐人的公共卫生意识、污水处理意识,又保证了长安城良好的人文环境,城内的放生池和官方推行的断屠钓措施也体现了唐人初步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唐代长安城居民体现出的环保意识,以唐官方为主导,城内民众参与,同时设置严格的法律规定和较重的处罚去约束居民,使其自觉维护城市环境的良好状况。唐官方对长安城的环境保护措施,对污染公共环境的行为严厉处罚,对现代社会的环境保护和防治污染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 [1]刘 华.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2):111-115.
- [2]罗桂环.唐代长安城绿化初探[J].人文杂志,1985(2):93-96.
- [3]何启泽.唐代长安城道路绿化初探[J].中国园林,1989(2):26-27,12.
- [4]刘 洋.从唐代诗文看唐人的环保意识[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123-124.
- [5]刘 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6]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7]王 维.王维集校注[M].陈铁民,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384.
- [8]王 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 [9]骆天驷.类编长安志[M].黄永年,点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79.
- [10]宋敏求.长安志[M].辛德勇,郎 浩,点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
- [11]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495.
- [12]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3]李 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1874.
- [14]张 鷟.朝野金载[M].赵守伊,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75.
- [15]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16]董 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757.
- [17]马得志.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J].考古,1963(11):595-611.
- [18]赵 强.略述隋唐长安城发现的井[J].考古与文物,1994(6):71-73.
- [19]安家瑶.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90(1):45-55.
- [20]王玉清.西安北郊唐水道清理简报[J].文物,1959(8):27-28.

- [21] 樊国强,何岁利.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03(11):7-26.
[22]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6485.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f the Tang People

—Take Chang'an City as the Center of the Tang Dynasty

Zhao Mingyang¹, Li Pei²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China;

2.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China)

Abstract: Chang'an City, the capital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the largest city in the world at that time. The population was numerous, the economy was developed, and the city was huge. In order to create a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environment for Chang'an city, i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Chang'an city were reflected people'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such as consciousness of environmental greening, consciousness of city appearance, public health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of sewage treatment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Chang'an city in the Tang Dynasty was l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participate in the protec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strict legal provisions and penalties constraint. The government and residents made great effort to the environment of Chang'an city in the Tang Dynasty, which was worthy of being used for reference by modern soci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Key words: Tang Dynasty; Chang'an City;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green; public health; sewage treatment

(责任编辑 张春生)

(上接第 52 页)

- [17]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M].严可均,辑.北京:中华书局,1958.
[18] 邓安生.蔡邕集编年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9] 常 璩.华阳国志[M].严茜子,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10.

The Study on Martian Divination and Its Political Function in the Han Dynasty

Zhen Jinzhong

(History and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Zhengzhou, Henan 450015, China)

Abstract: Mars was regarded as a bane since ancient time and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in Astrology of the Han dynasty, the deducing dictio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ar, funeral, famine and disease, etc.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hought of heaven and man, the astronomical phenomena deviated seriously from normal orbit included the Mars enter the Supreme Palace Enclosure, Mars staying at Antares, Mars staying or violating Ghosts and the Southern Dipper, and join or violate with other planets were deemed to signs of coming of greet disaster. These become important excuse that ministers and Confucian classics persuaded the emperors to cultivate their moral mind and carry out the policy of benevolence, it plays a most special role in political ope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Key words: The Han dynasty; Mars; divination; deviate from normal orbit; political function

(责任编辑 张春生)